

一、20 世纪初期的英国

理解英国文化的内涵 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西方的史学家来说，18 世纪之前的欧洲在越过了中世纪的兴衰之后，都开始按照基本一致的步伐走向近代国家形态。逐渐远离上帝的世俗国家在 15 世纪到 18 世纪的 300 年里发现了太多的理由，也发现了无穷的、可能的财富。然而 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之后，欧洲国家从眼界到思路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差异。英法两国的思路渐趋成熟 尽管它们走的路各不相同。而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的诸多城市共和国仍然在徘徊 这种犹豫不定不是一种选择而只是一种存在背景。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以至于不了解这个世纪的种种特征就没法理解当代英国文化的独特内涵。这是因为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相对而言比

较完整。在英国文化中，我们总是可以看见某种独特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体现在英国人的幽默、绅士风度上。从内在来看，这种自豪感体现在英国文化自身的反思能力上。英国文化对传统的强调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例证。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英国人就一再骄傲地宣称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宣称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就要求一个观察英国文化的人必须返回到英国的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英国文化在 19 世纪所遭受的种种动荡在它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上都有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在文学中，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正面临着现实残酷的冲击。这种冲击对英国人来说和 20 世纪中国人所受到的冲击有一致之处。这是一种无奈感和现实感的交替。与此同时，一种文化在饱经风霜之后的宽大也在这种冲击中逐渐站稳了脚跟。这一切就是英国人骄傲的根源。

19 世纪的英国，从今天看是一个反省代价又不断支付代价的一个世纪。在这种与历史的讨价还价中，英国逐渐确立了它所具有的独特性格。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等等思想由此而生发、成长。值得后世注意的是英国本身并不具备一条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的完整的思想史线索，只是有一些踪迹可寻。这些不太完整的线索的重要性在于证明了观察英国文化的另一角度：社会变迁史。一种近距离的观察有助于得出某些切实而且清醒的认识。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态度。历史本身就是由这种态度出发而得到了一定的还原。

对于历史或者个人在历史中的事件而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是偶然性是如何延宕了或者说改变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逻辑可能性）另外一点是可能性在获得实存之后是如何发

生了变动。无论如何 当我们走进历史的时候 我们都要记住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命运更为晦暗难测”。因此 即使我们清楚而且准确地把握了上述两点蕴含了时间性的要求，一个民族的文化事件总是有它所无法参透的神秘，这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的偶然性和无定性。19 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感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的来临 也是这样感受着往昔的离去。

1. 工业革命对 20 世纪初期 英国文化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它的过去如此完整地带入了现代生活。历史的联想对于我们决不是在重大场合下进行修辞的参考，而是英国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历史的联想影响着英国人关于这个民族生活赖以建立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这是曼德尔·克赖顿于 1896 年印行的《英国民族性格》中充满英国式凝重感的一段话。这种概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错误。我同样坚信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历史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理由。虽然并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克赖顿有一点把握得相当准确，历史已经为英国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权利和义务的概念。19 世纪的英国所提供的这两个概念是两个现代性命题。也就是说，从结果上看，这两个概念脱离了神正论色

彩。确立了把此岸的事件交由此岸处理的准则。克赖顿的不太完善的地方是：英国带入现代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通常出错的一个环节是：把我们身上较为适应此刻的生活的品质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选择的结果，看作是一个民族自觉而为之的历史。以为从此出发，就可以推断出往昔社会的某些关键特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不是完全如此 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民族如同感，这种如同感多多少少也具有自我欣赏的特征。这种自我欣赏会使判断者更加倾向于价值合理性的判断。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英国人的性格和文化性格中的非自觉成分在某种程度上被现代性问题所掩盖，时间的纵深被简单化了。那么 探讨 19 世纪英国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乃是：它留下了什么可以留下去的品质？它驱逐了那些不可传承的东西？对于探讨一个单面向的共时时段而言，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因为未来的指向不一定是非常清楚的 而第二个问题则会带来或多或少的自信和成绩。

如果用一个简明扼要的术语来描述 19 世纪初人们的复杂心情，类似于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种带有某种情感指向的术语一般都会带来某种误解。因为这些词汇表达的是后来者对前一个时代的肯定。而历史事实是 任何一个时代 尤其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成就背后的持久的抱怨和种种阻碍，因为正是在这些抱怨和阻碍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事物为何如此的某些真相。托马斯·卡莱尔用了无比长的定语，只是为了限制他给这个时代作的总结 机械时代。在《时间的信号》1832 年的版本中 这个词无疑具有彻底的心理震动感 和工业革命这样更为庞大的字眼不一样的是：前者所带来的心理感觉属于

它自己的时代，而后者则属于一个远离了的时代。当我们今天用复杂的心情说到工业革命时，也许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卡莱尔用机械时代这个词所表述的一种隐含的恐惧。由机械时代一词到工业革命一词表明了一种心理的变化，不仅仅在英国，可能在所有走进现代的国家都发生了。这就是对一种异己力量的恐惧和不知所措到对这种力量的肯定。这之间的差距如同彭斯和爱略特这两位著名诗人之间的差别。一个在歌唱乡村，另一个在描述现代社会中的空心人和种种荒谬。

“发动机一开始，人们就必须工作。”这是 J.P. 凯于 1832 年对曼彻斯特棉纺工人的描述。虽然我们今天在对机械时代的评价中总带有一份对穷人或者说被迫出售劳动力者的同情，我们总能从时代的记录中品评出一种更深的意味：“英国人们从来不是由于瘟疫、饥饿或战争，而是由于建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工厂制度的工厂制度，才使自己的生命力受到如此致命的打击。”这句话首先让人感到一种上文所说的同情，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句话：建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工厂制度的工厂制度，事实的反面究竟是要一种“建立了正当的保护措施的工厂制度”还是“取消这种制度”才可以对英国人民的生命力起到某种恢复作用呢？说这番话的人是牛津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约克鲍埃尔。他在 1901 年的述说至少可以肯定这样一种状况：对 19 世纪的态度在 20 世纪初仍然暧昧不明。因此，以一个宏观而又缺乏细致缜密的手段，我们不太可能捕捉准确（相对准确）的时代信息、心理倾向。我们必须将历史置入更为晦暗难测的个人历史当中，有时是某些在我们的口头悄悄发生变化的词语的历史。

从 1837 年到 1901 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在文学史有着不太为人熟知的一面。比如说，今天我们通常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来指称一种那个时代的色情小说。当然不排除对这个概念的某些使用方法仅仅表达某种时间性。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小说的注意可以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现象指明某些价值的失落。我们至少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从文学来看文化，有一个大致对应的方式可以被观察者所把握：文学中对恋人的描述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最深刻的品质或者是最流行的品质，当然后者可能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在色情文学中，人之为人的反常和荒诞的形态比比皆是。那些色情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证明了这是一种混乱和失序。

一些在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人物，通常都意识到了他们处于一种新的文明的开端。这种文明以财富的积累为其起点（今天有人认为是这种文明的终点）而且财富的积累要远远快于文化的积累。传统和它在 19 世纪所面对的繁荣之间的距离制造了一种失落，同样在那些以思考这个时代为己任的思想者那里，这种失落转化为一种孜孜不倦的探求。这种探求是自信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脱离传统，没有反思传统。同时，这种探求也带有某种深深的忧虑。从那个时代本身的语言中我们找到了一种普遍的评价：“突然发迹”的文明。从理论上来看，突然的或只经过极为短暂的时间的增值过程在今天来看带有某种不公正因素。因为这种增值必然是对某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也就是说是在社会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失之上的。因此，从当时英国人对这一崭新的现象的评

价中我们读出了两种滋味：不满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畏惧。19世纪是一个心理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对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分析的需求基础就是整个文化心态的失衡。早在17世纪 霍布斯就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人产生了某种争斗，社会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战斗。正是这种人的社会心理定位在19世纪产生了某种心理学上的欢乐。

在当时，一种文化倾向我们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事实。直到1835年 英国最有影响的激进派政治刊物《政治记事》周报拥有一位伟大的激进派成员——威廉·克贝特 克贝特作为一个反雅各宾主义者在《政治记事》上强烈抨击了新英国。这位所谓的‘工业无产阶级第一位捍卫者’的抨击是激烈而又锐利的。克贝特的观点和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思想在时间纬度上恰好是相反的。对于克贝特来说，他的理论资源是整个英国在历史上的经验 并且没有对未来的某种建构 而马克思对此时的抨击却是对未来的展望。因而二者在很多问题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也就是说，一个是前瞻的一个是回顾的。另外 克贝特的火力集中于质疑工业制度本身 使得他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社会学的批判。

有学者认为在抨击工业制度的时候，克贝特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一个带有哈代式的怀旧情绪，他深深地眷恋着“我出生时的英国”这个时候的克贝特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下人 另外一个则是劳工运动的坚决支持者 劳工权利的坚决捍卫者 这个时候的克贝特是一个斗士。我们认为 克贝特的这两个面向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二者尽管重点不同，但

是如果放在 19 世纪的英国的大背景之下来看的话，二者是非常合乎时代的思维逻辑的。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往昔的时日的确因为其平和温馨而让人魂系梦牵，但是机械时代已经不可避免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抱怨不如适应，适应不如作出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看上去更加美好一些。这种心理状态可以说是英国在 19 世纪所有特征的深层理念机制。而且这种机制还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缘由。

从克贝特的思想来说，他对往昔时日的怀念，不仅仅是“我出生时代的英国”而且是整个失去的历史。克贝特在他的思想中展开了对中世纪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显然带有将中世纪理想化的做法。对于克贝特而言，“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修道院作为社会标准另行建立一个公社式的社会，以取代个人主义”。他所著的《新教改革史》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这本书在英国的发行量极大，在当时的英国人生活中，这本书起到了极为重要和明显的作用。克贝特的怀念并不指向真正的中世纪，他所怀念的是中世纪存在的一种思想和理念上的整合力量。他以个人的方式表达了对个体进行整合的悖论。这种思考对后世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和社会所谓的集体之间的关系命题，这个命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自由主义和某种集权方式的冲突。另外一个方面是克贝特的情绪成为 20 世纪怀疑思潮的开端。这种对往昔时光的理想化的缅怀，在 20 世纪初演化为一种极为独特的心理机制。尤其是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这种理想化的缅怀被抽掉了最后一根肋骨。克贝特的名言“我出生时的英国”就是一种对社会全面怀疑和痛恨的开始。从往昔的安宁

到现时的抱怨，工业革命到底在心理上给英国人带来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东方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比如阿 Q 式的调侃 我祖上的时候……

这种缅怀或者说这种留恋从反面表现了 19 世纪的一种普遍的畏缩心理，一种被时代无情碾压的感觉遍及英国。正是这些杰出人物的呼声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见：19 世纪的英国在理念上对工业社会的抗拒 当狄更斯写下《艰难时世》的时候 也许很多英国人都怀着深深的忧虑看着未来。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我们仍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清晰地看见古老的等级制度遗留下来的种种形式，这些依然存在的形式至少部分地证明了某些古老的价值依然得到了坚持 某些传统中的价值判断依然存在 只是这种价值不再像以往那么普遍。可以说，产业革命是英国人带给来访者的第一次震惊 那么 依然存在的许多古老的价值、众多往昔时代的痕迹会让来访者在震惊中产生深深的迷惑和敬佩。在一个充满新事物的世界里，旧事物的坦然存在有时更能显示历史的深度！在 19 世纪的英国，一个濒于破产的贵族比一个暴发户赢得更多的尊敬。两个时代的价值判断都在起作用，也同时都丧失了一部分作用。这就是英国“不仅仅有稳定和统一的一面 还有丰富多彩和参差不齐的一面 既明显又隐晦”。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充满强烈对比的时代，对比被用来形容几代人所延续的反思习惯。这种习惯准确地表达了一种特有历史下的氛围。只有在事物的差异导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裂缝之时，人们才会发现生活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元组合，今天使人们产生猎奇兴趣的事物在昨天可

能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证明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对比的社会评论家之中，巴热特的论证是最有充分说服力的，英国在巴热特的眼里是一个刚刚跃入现代大海的游泳者，他的头脑和视野已经深深陷入了苦涩但又宽广的海域，但是他的脚步仍然带有对土地的无限留恋。一方面巴热特指出了新的文明的一大表征：这个文明获得了成就的阶层，另一方面他也准确地指出了“愚昧无知”的劳动者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个阶层在地域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开始发生了联合，事实上，这两个阶层之间的裂缝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而且这种对立一直在延续，只不过我们今天看见的这种裂缝的形式是一场思想的论争而已。社会交往以及思想交锋，在那个时代都没有很好地展开。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女王本人代表了一种在历史中延续的传统的变化向度。因为人们还是像往昔一样热爱他们的女王。

然而女王只是一个象征 她并不能证明什么 而且君主制的衰落也不需要女王去证明什么，人们之所以如此热爱女王，不过是在给自己找到一种统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象征而已。哈罗得·麦克米伦最终道破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没有意识到维多利亚时代只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中断的现象。一种由此而产生的裂缝和差异是无法依靠一两个君王来弥补的。另一个英国人以一种特有的幽默口吻说道：19 世纪中叶对我没有什么感染力。这大概是出于我对自己的父辈所惯有的那种天生的忘恩负义的感情。

如果用回顾的眼光和心态生活于 19 世纪，那么除了一种

深深的失落感之外，一个人不会再有什么别样的寄托。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 19 世纪而不是更早一点的 18 世纪才会产生众多的英雄主义哲学，比如卡莱尔的、比如尼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 世纪是一个和上帝逐渐分离的世纪。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英雄和超人才真正地意味着对一群茫然而又带着些许期盼、些许失落的民众的领导。19 世纪的英雄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十分清晰的回答。但是从这样一个词：“精英”中可以得到某些启示。这个开始用于 17 世纪的词汇本来是用来形容质量精美的商品，但是当它于 1823 年出现于英语之后，被逐渐运用于社会、政治之中，并且由众多理论家完成了精英理论的建构。对于创建这一理论的莫斯卡和帕累多而言，这一套完整的理论就是要解释知识分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这对英国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用的分析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 20 世纪的英国人来说，知识分子一直保持了这种从 19 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最近的例子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老师就是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用自己的理论影响了当代英国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在 20 世纪的另一个例子是，哈耶克的思想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些方面，一个观察者可以敏锐地看出当代英国文化和 19 世纪那种既接受又反思的关系。

可以说 19 世纪的知识分子或者批判 或者反讽 或者应和他们以不同的态度塑造的这个世纪的英国风尚。前面所到的克贝特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他的思想当中，克贝特除了将中世纪理想化之外，相对应的思想就是对新的文

明的一种批判。

对工业文明的批判通常落足于这种文明内部所蕴藏的演化的和异化的力量。这种对这两种力量的强调可以在任何一种批判理论中找到。对于克贝特来说，他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所借用的经验资源直接来自于对英国工人生活的观察。在那些产业雇佣工人当中，尤其是在那些矿工家庭中克贝特找到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在 19 世纪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有着大量的矿工家庭，他们主要分布在还没有城市化、半乡村的地方工作。矿工家庭的经济结构是双重的 除了采矿业本身具有的工资以外 他们还从他们自身所从事的小农经济中得到一定的补充，比如一块小菜园、比如一小群家畜。在 19 世纪的后半期 这种双重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矿工由前工业时期转入大工业时期。后一种经济来源逐渐变得微不足道和于事无补。这样 被称为‘产业无产阶级’式的生活条件是这些矿工惟一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不是细小和无关紧要的，这种变化将大多数矿工家庭的妇女和儿童推入了向外的劳动结构之中。他们干一些劳动力较少的活计，当然这些活计是非常繁重的。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经济收入的家庭就从工资加小农业生产的模式，转化为单一的收入结构。只不过在这种单一的收入结构中一个家庭依然有多重支柱而已。这样，一个家庭就其经济结构而言依然是二元的，一方是有着强壮体魄的丈夫，另一方是妻子和瘦弱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考虑劳动者本人对这种生活的适应程度的话，那么每一个观察者——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对这种生活就会充满了愤怒。

“在英国，一位只有一妻三子的劳动者，虽然未曾一天停止劳动，虽然全家省吃俭用、努力勤奋，但是任他如何辛劳，如今却终年吃不上一顿肉食。这难道是劳动者应处的状态吗？”

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愤怒，也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批判，英国采矿业的工资相对于其他的产业来说是较高的，当然这种结果是 20 世纪的事了。

纺织工人的生活或许更能显示机器和人之间的二元紧张。纺织业的进步通常就是劳动量的变化和增值。“男人、女人、孩子们都一起被套在钢铁和蒸汽的轭具下，动物机器……被紧紧地拴在不知痛苦和不知疲倦的钢铁机器上。”今天看到将人称为动物机器所引发的感觉恐怕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一种畏惧。但这并不能因此断定我们今天的想法就一定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的想法。历史没有给支付劳动的人太多的空间进行直白而且不加任何修饰地宣泄。所以，这里留下了一个难题：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和整个产业工人的反抗的指向是不是一回事？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批判对于 20 世纪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不仅仅是英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面，而且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从本质上而言，是发端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从过程上而言则是经过了 19 世纪英国文化中对工业文化的指责。理解这一段历史对理解当代英国政治文化、经济生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 20 世纪英国大众文化的内涵来看，这种大众文化的最直接的底蕴是 19 世纪的市民文化。大众文化的特征是以消

费和娱乐为主旨的，对于精神层面上的体会和领悟则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大众文化在英国 19 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下面主要描述这个文化在当时所激发的反响 而在 20 世纪的变化和发展则留在以后的章节中。

在 19 世纪的工业民众中蕴含的文化是种彻底的平民文化 给这种文化所下的最粗糙的定义是 经验和实用的 追求自身的直接目的。这个粗糙的定义指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平民文化不追求超越的层次。也就是说，理念机制不能自身推衍。而知识分子的批判显然立足于一个可能获得存在的目的 或者是一种乌托邦 或者是一种改良政体。如果说平民文化只是追求一种 “ 让下层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过得去的生活 ” 的话 知识分子追求一种理念上的公正、实践上的正义。这是二者的差别之处。下层社会，具体而言是产业工人只有在上层人士违背道义经济原则 —— 常见的是 商人、企业主违背 “ 公平价格 ” —— 时，才会深深地愤怒。表达这种愤怒的方式是暴乱 是骚动 而不是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矿区里，妇女通常是此类活动中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因为男工、女工之间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在 1848 年革命时期“，保守的编年史作者的诽谤性小册里 充满了对妇女的特别的仇视，并用明显的性别歧视或色情的口吻丑化妇女 ”。这一现象从反面证明了上述判断的正确性。暴动和骚乱本身并不带有革命性质。而且产业工人的政治态度和其平民文化是一致的 就文字的表达形式而言 知识分子乃是茫然而愤怒的，下层的劳动者是悲伤而抱怨的。二者的合作需要一个契机 需要明确一个确然的阶级的身份 同时需

要确然与该身份相配的社会、历史地位。这是一种从理论上设定的正义。如果被实践证明，它就将无组织的暴乱和骚动组织起来，达到一个目的和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目标。

在 19 世纪的英国，与产业工人的生活态度类似而又不同的一大阶层乃是“市民家庭”。市民家庭和产业工人的划分所依据的不是同一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相反，二者的态度暗含了自由党和工党的某些差别。可以说受到新的工业文明梦想召唤的是市民家庭的文化，而产业工人却背负起了个体、小家庭为获得这块梦想蛋糕的一小部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资产者来说，他的家就是他的世界的核心，因为这里也只有在这里，那些市民社会的问题和矛盾才能被忘却或被人地消除。这里也只有在这里，那些市民更多的是小市民家庭才能滋生和谐的有等级的幸福的幻想。他们被物质产品包围着。正是这些物质产品才使幸福显现出来，同时也使之第一次成为可能。”这种市民家庭模式在 18 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存在。但是此时的市民家庭的范围是狭小的，包括财产市民，比如企业家、银行家、经理、文化市民，拥有较高学历的自由职业者。在这个范围内所形成的文化是趋于贵族方式的。19 世纪早期的英国，这种特征十分明显的原因在于：贵族和商人身份的合一，造成了一大批贵族商人，即握有权力又握有财富。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市民阶层内部的分化加剧，高居上层者依然如故，而原有的一部分中等阶级、小的独立的经营者成为小市民阶层。这样，市民阶层贵族化的同时，也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丢开贵族化的面纱。

直接追求物质目标，并以此目标为最终目标。这一时期不仅是英国文学而是整个欧洲文学都刻画了系列守财奴式的成功者 这正是上述倾向的一种反映。

解释这一现象的经典理论是 20 世纪出现的新教伦理这一观点。为上帝而工作或者说工作以求得到来自天堂的许可造就了生活世界的种种追逐。这种追逐当其从工作欲转化为赢利欲时，市民的诚实和公正就会被不惜一切的赢利目的所取代。这种转变可以从一个心理积淀的过程来看，也可以从市民社会的上层数量的有限度来看。后一种角度，我以为是 将社会权力看作一个大致的定量 为一批精英 统治精英 所拥有，而统治精英的数量是有限的。当某一社会出现了过多的精英 相对于统治精英所需的必要数量)总会有一批人失去某些政治乃至其他领域的参与权。当一项劳动本身不能超越时 它只能以它自身为目的 它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从 20 世纪回头来看这段历史 人们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因为英国文化就在这些看似繁琐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奠定了许多新的品格，这些品格不仅仅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与 20 世纪的发展息息相关。

市民家庭以及由市民家庭所形成的市民文化是工业革命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产物。这种文化的怀疑者和支持者最后都发现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尴尬处境。一些切实的生活问题成为了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一些文化论争以飞快的速度转化为利益纠缠 文化本身接受异化的考验 生活世界从 19 世纪开始就一再显示了它作为一个染缸和变形器所具有的特殊威力！

2. 小说、诗歌和它们的时代

英国在 20 世纪之初已经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 但是这些财富并不能掩盖这个时代英国生活和现实中的阴郁。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前 50 年英国的文学创作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把握那个时代中可以被称为悲惨和无奈的东西。当然也有阳光 但是在作家的眼里 微弱的阳光已经被伦敦上空浓浓的大雾所遮掩。我们首先接触的是小说，因为这个时期的小说依然坚持了某些古典主义的笔法，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他们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记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特点。

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托马斯·哈代。哈代的创作所反映的时代从 19 世纪的末期一直到 20 世纪的前 20 年。在他的创作中 历史是流动的。这种流动让人感觉到一个 19 世纪的作家的无奈 同时也让人感觉到一个进入 20 世纪的英国人的冷静。这些在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在这些小说中，哈代集中描写了英国西南部农村生活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看作是英国向过去告别的最后仪式。也可以看作是英国走向 20 世纪时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这里在英国历史上称为威塞克斯地区，哈代的全部笔触就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在这部系列小说中，《绿荫下》是它的开始。这部小说让